

“拜占廷宗教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辨析

左少兴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提 要：本文在于阐述我们对所谓“拜占廷宗教文化对罗斯文化的影响”的相关学术观点。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也是其命题）是值得澄清和商榷的。因为在古代希腊和中世纪希腊（即拜占廷）历史上，他们的文化从来也没有只限制在宗教文化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拜占廷；（俄）罗斯；宗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希腊政府派出一个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访华期间特意到北京大学参观访问，并与北大校方商讨在北京大学设立“希腊文化研究中心”等问题。事后，在我国政府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经过一番筹备，在北大成立了一个相应机构，附设在北大历史系。这就是北京大学于2011年初正式成立的跨院系实体教学科研机构——“西方古典学中心”，十分可喜的是：北大（包括古希腊和拉丁文等学科的教学研究在内的）“西方古典学中心”引进了多位在西方欧美及希腊等国留学并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专家学者已着手开展有关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这些举措对于开展和深化中国和希腊这两个文明古国以及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促进我国学术界对希腊文化以及古代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笔者所知，北大当年只有几位老一辈学者（有人已经“作古”）学过希腊语，只有少数系科（如哲学系、历史系、宗教学系、原西语系等）的部分教师从事希腊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但都偏重于古希腊—罗马，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于中世纪拜占廷文化的研究，目前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有时甚至把拜占廷文化置于学术“视野”之外。例如某些研究欧洲文学史的著作在谈到欧洲中世纪文学时，没有总体介绍“拜占廷文学”的独立章节，有的则把它分散在其他部分“简略而过”，或者把它置于“希腊文学”希腊文学总的范围之内，作为“古希腊文学”和“近代希腊文学”之间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称之为“古希腊文学”和“近现代希腊文学”）¹。但是国内某些出版物中也有单独提出“拜占廷文化”来论述的²。总的来说，我们对“拜占廷文化”的全貌还是比较陌生的；对它的认识，从深度和广度来说，仍然很不够。

俄国（包括当年苏联）和一些斯拉夫国家对拜占廷研究的情况较好；他们不仅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及其影响，而且也研究中世纪拜占廷文化及其影响，特别是对斯拉夫—俄罗斯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有了不少成绩，出版了一些科研成果。在苏联时期，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拜占廷学”（Византиноведение），出现了一批“拜占廷学家”（византинисты）。在

学术史上，俄国当年（17 世纪下半期）还设立了“希腊—拉丁—斯拉夫学院”等。苏联科学院和一些高校设有相关研究机构，开设相关课程，出版众多刊物、专著、文集，例如经常发表关于希腊语、古希腊文化、拜占廷文化及其与斯拉夫文化的关系等论文的期刊（如：《世界文化通报》、《古代世界》、《历史问题》、《语言学问题》、《斯拉夫语文学》等等），定期出版《拜占廷年鉴》等。其他斯拉夫国家也发行相关期刊和文集，如捷克的《拜占廷—斯拉夫学》（Byzantionslavca）、波兰的《（拜占廷希腊人）美弗基纪念文集》等。

苏俄学者认为，在研究拜占廷文化，特别是拜占廷文学方面，还存在某些问题：“拜占廷文学史是拜占廷学中研究得不够的一个方面。（俄国）只是在 19 世纪末才开始研究，而且研究工作的开展也缺少力度……”（Крат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62: 956）；苏俄学者还批评一些人对拜占廷文学的片面认识。这些人认为拜占廷文学是以“神学题材”（Богословская тематика）为主，从而断言拜占廷文学在整体上是“宗教文学”。在“这些人”中不仅有西方的学者，而且有俄国东正教神学界文化人士等。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我国学术界已有人着手认真研究拜占廷文化。新世纪一开始就出版了陈志强教授撰写的《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 年）。此书问世，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它开创了我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希腊中世纪-拜占廷文化的先河。我们十分赞同陈志强教授在该专著中的论点：“……在文化上，拜占廷国家既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又是属于新型中古文化的创造者；拜占廷文化是中世纪欧洲独特的文化之一……”（陈志强 2001: 40）上世纪 80—90 年代两度赴希腊学习语言、文化等多门学科的陈志强博士的《拜占廷学研究》这部专著主要介绍了如下六个方面，即“拜占廷史学问题研究”、“拜占廷经济问题研究”、“拜占廷政治问题研究”、“拜占廷宗教问题研究”、“拜占廷文化问题研究”、“拜占廷对外关系问题研究”等。但是我们俄语界的一些学者，主要是通过学习研究俄罗斯—斯拉夫学或者欧洲中世纪历史、文化等学科来初步了解希腊文化及拜占廷学的某些门类。但总的来说，掌握材料不足，认识也不够深入。正如陈志强在《拜占廷学研究》的“前言”中所写：“由于拜占廷希腊语艰深和有关的历史资料不足，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于其他学科”，“‘文革’前我国学者的有关文章也是模仿苏联拜占廷学家，人云亦云，毫无独立建树……”；“拜占廷学博大精深，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仅涉及其皮毛……”

笔者认为，我国俄语界对拜占廷及其文化的认识也不过“皮毛”而已。更有甚者，个别人根本没有接触（更谈不上如何深入研究）拜占廷帝国历史、文化等学科、就侈谈古希腊、拜占廷“如何如何”。个别人提供的“知识信息”似是而非，矛盾百出，错误不少。下面我们将分几部分对此加以介绍和“分析”。

2 拜占廷文化不是单一的“宗教文化”

俄国东正教神学界文化人士以及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的文化人士的“文化观”认为，上帝是“神圣、无限和永恒的精神实体”、是“绝对的创造者”、“人类历史的主宰者和统治者”；认为世上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果都“出自于上帝”、“源于上帝”；宣扬“宗教是文化的本质和核心”，“宗教向人类提供了真正的精神价值”等等。（乐峰、文庸 1995: 108；乐峰 1999: 54）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著名宗教学家赵复三先生所说，“宗教只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赵复三 1985）这在中世纪时代的西欧和拜占廷等“东欧”国家都如此。尽管中世纪被称为“宗教世纪”、“信仰时代”，尽管在中世纪“宗教文学盛行”（曹清华 1989: 6），尽管中世纪宗教文化起过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拜占廷文化和西欧文化都不是单一的“宗教文化”；因为它们的文化根基的主体部分是以拜占廷保存的古希腊文化——古典文化遗产为基础的。虽然这些文化后来也渗有其“信仰成分”——即吸收源自公元初年兴起的宗教——基督教的成分。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拜占廷文化是由古典文化遗产（或者“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或者“亚洲文明”）这三种因素交融结合而成的独特的“新的中世纪文化”（邓裕新 1986：17）。虽然“拜占廷在发展过程中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但“它所创造的文明样式在总体上仍属于西方文明的范畴。”（徐新 2002：157）至于“西方文明”，具体说，“西欧文化”，也是“在古典传统、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这三大因素之间的剧烈碰撞和相互作用之下萌生”的“独特的西欧文明”（李赋宁 1999：81）。

在此，我们特别要强调拜占廷同希腊文化的关系：它们不仅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而且拜占廷文化（作为欧洲中世纪的一种文化）在古希腊文化和近现代希腊文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千余年的历史上，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多有建树，因为它较好地保存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数学、文学（诗歌、戏剧等）等，特别是恢复在罗马帝国时期（当时在宗教、行政、科学、文化等方面主要使用拉丁语）被长期“压抑”的希腊语的语言文字的地位。同时还要指出，多神教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传统宗教，那里的“万神殿”就是当时多神教的具体体现。

因此，所谓“拜占廷是东正教国家（确切说是当年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拜占廷文化是宗教文化”，“拜占廷文学基本上是宗教文学”（任光宣 1995：50）等这些论点和说法（比较前面引用的俄苏学者批评某些人所认为的“拜占廷文学是以‘神学题材’为主的‘宗教文学’”），究竟有多大的理据？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分析、探索和研究，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看法。

拜占廷帝国及其文化在中世纪欧洲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周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对斯拉夫各国文化）有过重要的影响。恩格斯当年曾指出，拜占廷在使中世纪西方认识古代文化（主要指古希腊文化）遗产方面起过良好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拜占廷帝国对后来（公元7—9世纪）立国的斯拉夫国家，包括基辅罗斯，在文化（广义的）上的影响，决不仅只是在“宗教文化”方面。在拜占廷的传统文化、社会文化、历史文化等方面，在制度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等方面，对斯拉夫国家都有过影响。“反映拜占廷法律最高法律成就的《民法大全》（注：公元6世纪制订的，又称《国法大全》）成为未来若干世纪内西方法律的基础，近代西欧、俄罗斯、拉丁美洲等国在制定宪法和法令时都曾参考过它，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徐新 2002：158）。如上所引，“宗教只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而“宗教文化”也只是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 以斯拉夫文字为例来看“拜占廷宗教文化的影响”

文字是文化的“面貌”，也是文化的“载体”。字母—表音文字（或曰“拼音文字”）的产生与“书面文献”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恩格斯 1995：22）。在《俄国文学与宗教》一书中提出了几个有关文字的问题：“古罗斯文字是何时出现的？这种文字的出现与基督教传入罗斯的关系如何？……（任光宣 1996：44）”但是，该书作者并没有言明当基督教——拜占廷东正教传入古罗斯（即公元十世纪末期的基辅罗斯于988年接受基督教）以及在这之前的9—10世纪传入其他斯拉夫地区时，宣传基督教—东正教的教义、教理（以及所谓“思想、内容、形式、形象等等”）的“物质载体”究竟是什么？那些早期斯拉夫文献是否用文字书写（记载）？而且主要是用何种文字书写的？说一句切题的话：古代罗斯（不只罗斯，而是整个斯拉夫地区）文字（我们在这里指的是（斯拉夫）“基里尔字母文字”）的“出现”，是否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比较苏联著名语言文字学家 B.A. 伊斯特林在《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一书的说法：“第九章”一开始就写道：“斯拉夫文字产生的历史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Истрин 1965：

403)。《俄罗斯概况》中写道：“目前还无法断定斯拉夫人的文字是何时产生的。”（郝斌、戴卓萌 2012：198）这里的“斯拉夫人”恐怕是指“古代俄罗斯人”。

有关斯拉夫、罗斯文字及文献的诸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斯拉夫文字史上历来存在分歧的看法。学者们至今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基督教——或者具体说“拜占廷东正教文化”——对斯拉夫文字的影响。在斯拉夫文字史上存在着不只一种文字类型。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公认的“基里尔字母文字”（即现在的俄语、保加利亚语等的文字的前身）上，那么拜占廷文化（其中主要是其“宗教文化”）对斯拉夫文字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保加利亚著名学者 E. 格奥尔基耶夫深刻地指出：“希腊人是斯拉夫人的老师”（Георгиев 1952：75），是斯拉夫文化的“启蒙者”，他指的“希腊人”不仅是指拜占廷时期的希腊人，也指“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他指的给斯拉夫文化的“启蒙”，不仅在“宗教文化”方面（这是主要的），也在其他文化领域。公元 9 世纪 60 年代，拜占廷学者、传教士基里尔、美弗基兄弟在西部斯拉夫地区的摩拉维亚王国（即今捷克等地）传教的同时，以希腊字母为基础为斯拉夫人创制了一套适合斯拉夫语（当时东南西三部斯拉夫各国的语言差异不如现代诸斯拉夫语那么大）语音特点的“斯拉夫文字”（славянское письмо）并用这种字母文字把希腊语的一些宗教典籍译成“斯拉夫语”（又称“古斯拉夫语”或“教会斯拉夫语”）。这是斯拉夫文化史上斯拉夫人一次较早地接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后来，由于一系列政治的、宗教的等原因，这种“影响”逐渐扩及到南部斯拉夫地区（在公元 9 世纪下半期——10 世纪初）和东部斯拉夫地区——基辅罗斯（从 10 世纪末起）（Истрин 1965：403—513）。

古罗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受拜占廷文化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无论是罗斯的精神文化（主要表现为基督教信仰）还是物质文化，如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教堂寺院的建筑、绘画（教堂壁画、圣像画等）、工艺品（如与宗教信仰有联系的祭器、装饰等），都受到拜占廷宗教文化的影响。

4 关于古罗斯编年史作品与拜占廷的关系

按史学界的普遍看法，“编年史”或“年代纪”等属于史学“编年体”体裁，即“按年月日顺序编写史书的体裁”。（辞海·历史分册 1980：388）。

对于“拜占廷的历史作品”受到哪些的影响的问题，多少学过一点中世纪欧洲史的人不能不知道 6 世纪拜占廷著名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ous，约 499—约 565 年，俄语译名是 Прокопий；我国亦译为“普罗科比”）及其著名的史学著作《查士丁尼战史》（О войне с готами，《对哥特人的战争》）；粗略读过一下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往年记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³）——12 世纪初撰写的人，不能不知道阿马尔托尔（Амартол，亦译为“哈巴托卢斯”等）这位 9 世纪著名的拜占廷史学家的名字及其著作《年代纪》（俄译名是 «Хроника»）。普罗科匹厄斯在其所著中仿效古希腊罗马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 484—前 425 年，有“史学之父”之称）和修昔底德⁴等人的风格；而罗斯《往年记事》的编撰者是罗斯僧侣涅斯托尔（Нестор）等，这部编年史的开头部分大段抄译（或者说“引用”）了拜占廷人阿马尔托尔的《年代纪》⁵（共抄了 18 处）。（Лихачёв, Еремин 1957：3—9）

其开头部分是在拜占廷人阿马尔托尔的“历史作品的影响下”写出的。

5 关于几部“拜占廷的”宗教文学著作

《俄国文学与宗教》一书中所提到的“犹太战争（史）”（俄译名是 «Иудейская война», 有的俄国文学史中用«История Нудейской войны»）一书是犹太史学家尤素福（通常译名为“约瑟”）于公元初年记述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韦斯巴乡父子先后率军镇压犹太人民反抗

统治者的一场战争。当时还没有“拜占廷”这个“国家”名称，并且这部作品并不是“……后来的军事历史小说”。

关于 11—12 世纪的两部译介“《大安托尼使徒行传》、《阿列克塞使徒传》”，在俄国文学史上这类作品称为“翻译的传记文学（作品）”（Переводная жи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Гудзий 1955: 99—106）。即使在中世纪“拜占廷文学”史上它们也可能属于用希腊语翻译的“翻译作品”之列。

应该指出，这两部作品不是“使徒”传，更不是“使徒行传”⁶，而是一般“圣徒传”。它们的俄语译名分别为《Житие Антония Великого》和《Житие Алексея человека Божия》。汉语译名是《大安托尼传》（或译为《圣安东尼传》），英语写成《Antony the Great》和《神的仆人阿列克塞传》（человек“人”古时有 слуга“仆人”、“奴仆”之意，божий человек 也有译为“神痴”的，即《神痴阿列克塞传》）。古俄语文献中后者还写成《Житий Святого Алексея человека Божия》（《神的（上帝的）仆人圣阿列克塞传》）。

其次要指出，两《传记》的主人公既不是拜占廷人，也不是耶稣基督的有“使徒”之称的“弟子”。他们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名人”。安托尼是早期基督教“苦行隐修”的创始人和修行者，有“埃及旷野虔修士”之称；而阿列克塞是罗马城的富贵人和“慈善家”。两人死后被基督教教会“追谥为圣”。

我们在俄语古文献（翻译作品）中读到《神的仆人阿列克塞传》全文（据 14—15 世纪抄本）。《传记》一开始就写道：

“Бе человекъ в Риме межъ благочествъ именем Ефимьямъ и его жена Аглаида при Онории и Аркадии славными цесарема римскими, велик бывъ в Боярехъ богатъ зело...”（Н.К. Гудзий 1955: 99）（试译如下：“罗马城内有一人，为人虔诚，名叫耶菲米扬（注：俗名，教名‘阿列克塞’，他的妻子名叫阿格拉伊达。他们生活在两位伟大的罗马皇帝奥诺里和阿尔卡迪的时代。耶菲米扬是大贵族，十分富有……”）《传记》中谈到耶菲米扬-阿列克塞家财万贯，奴仆成群，乐善好施。东正教会十分推崇他。按俄东正教《教历》每年 3 月 30 日（旧历 3 月 17 日）纪念他（Прп. Алексей человек божий“神的仆人圣阿列克塞”）。1998 年 3 月 20 日俄国《教历》上有一短文：“Пример жизни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Алексея говорит нам: богат—сделайся благодетелем нуждающихся, высок—пользуйся высотой для покровы и поддержки слабых и угнетенных, —будешь Человеком Божиим”（试译如下：“圣阿列克塞生活的榜样告诉我们：如果你富有——那就成为周济穷人的善人；如果你高尚——那就利用崇高地位去庇护和帮助弱者和受压迫者，这样，你就将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知道，公元 4 世纪著名（圣）经学家、拉丁教父哲学家哲罗姆（拉丁文 Hieronymus，英文 Jerome，约 347—419/420 年）——因其修订《圣经》的“古拉丁文译文”为《通俗拉丁文译本》（又称《圣哲罗姆译本》）而著称——就曾用拉丁语为圣希拉里翁（Hilarion，俄语为 Иларион，约 291—371 年，基督教隐修士）写《传记》，而这个圣希拉里翁当年正是“苦行隐修”创始人“大安托尼”的得意弟子。《圣希拉里翁传》同样也不是“拜占廷‘使徒’传”。

古代罗斯有一些译自其他语言的“传记”，而《传记》的主人公多为基督教教会活动家，但有的不是，而且也不全是拜占廷希腊人。略举几例：1）《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传》（Жит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кедонского），2）《金口约翰传》，是（埃及）亚历山大城大主教乔治所写（Житие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3）《（希腊）阿索斯山修道院圣彼得传》（Житие св. Пётра Афонского），4）《圣西米昂传》，（译自捷克文 Zivot sv. Sumeona, Житие Симеона），5）《摩拉维亚大主教美弗基传》（Житие Мефодия, архиепископа Моравского）等等。就以这里列出的五部《传记》为例，可算作拜占廷“圣徒传”的是第 2、3、5 三部。

6 关于“拜占廷的经院哲学”

俄国（及苏联）时期出版的“文选”，《1073年和1076年斯维亚托斯拉夫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其俄文名称是《Изборники（或 сборники）Святослава 1073 и 1076 годов》。必须说明，《文选》虽冠以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名，但却不是出自他之手。这两部《文选》是11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约翰（Иоанн）的书吏（Дьяк）为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抄写的。约翰抄自保加利亚人为保加利亚国王西蒙（Семеон，约864—927年）大帝用古斯拉夫语编译的文集——主要译自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廷的一些作者的著作片段、节录，还收录少量斯拉夫作者的“言论”。古代罗斯“从拜占廷和保加利亚引入了大批宗教书籍，也包括一些世俗性著作（历史故事、自然科学等）……”（曹清华 1989：6）古保加利亚等南部斯拉夫国家和西部斯拉夫国家在接受基督教并受到拜占廷文化影响方面，在时间上要早于东部斯拉夫—基辅罗斯。因此，在南部斯拉夫地区形成的文化也对东部地区有所影响。在“斯拉夫学”（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和“俄罗斯学”（русистика 或新词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中称之为“南部斯拉夫影响的”（южнославянское влияние）。第一次“影响”发生在10世纪末—11世纪，当时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接受了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上面提到的十一世纪的手抄《文选》（Изборники），可以认为是“第一次南部斯拉夫（文化）影响”的重要著作之一。第二次南部斯拉夫影响发生在14—15世纪，特别是1453年起拜占廷帝国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相继亡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一批学者和神职人员带着许多书籍著述（其中包括古希腊罗马典籍）西逃至拉丁语地区，东逃到俄罗斯等地，从而又带去了他们的“文化”。因此，我们在谈到罗斯受“外来文化”影响时，除重点谈及拜占廷文化影响外，不能不提及南部斯拉夫文化的影响。

我们在该《文选》介绍中读到，该《文选》选录了“拜占廷教父著作”的片段（отрывки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отцов церкви”）（Гудзий 1955：134），例如基督教神学家、希腊教父哲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约350—407年；在斯拉夫—俄罗斯文献中他以“金口约翰”——Иоанн Злагоуст 闻名，东正教会有他的“纪念日”）的著作摘录。研究者把9世纪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810/820—890/891年）称为拜占廷“经院哲学家”。该《文选》中是否录有佛提乌的“文章”，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摘录。但我们只知道，佛提乌是拜占廷的一位哲学家，曾当过君士坦丁堡的大学教授和两度出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教会的牧首。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他编撰的《书海集锦》（又译为《书目提要》——Myriobiblion，意为“许多书”）。这是中世纪的一部重要的“图书编汇”，从众多希腊-拜占廷作者的著作中收录有关历史、地理、医学、哲学、神学等方面的知识信息。这种采纳“百家之言”的汇编当然算不上是什么纯“宗教文学”，也算不上纯“哲学-神学著作”。

哲学史告诉我们，西方哲学史在基督教形成之后经历了教父哲学（又称“教父学”，英语为 patristics，俄语名为 патристика——“2世纪至12世纪基督教‘教父’著作的总称”⁷；俄语中的“教父”还写成 отцы церкви）和经院哲学（又称“烦琐哲学”，英语为 Scholasticism，俄语名为 Схоластика，主要涉及11世纪起中世纪盛期和晚期）这两个主要阶段。著名的“实在论”（又称“唯实论”）哲学家，被称为经院哲学的“鼻祖”，有“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之称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1033—1109年）（古谢伊诺夫·伊尔利特茨 1992：258—276），比拜占廷的佛提乌及保加利亚编译的《文集》，在时间上要晚一百多年。因此，所谓佛提乌是“拜占廷经院哲学家”和《文选》中录有“拜占廷经院哲学文章”的说法还得进一步“求证”。

7 关于罗斯时期科学著作

现在我们根据俄语古文材料简要介绍如下。

《六天》(俄语译名是«Шестоднев»等,我国还译为《六日赞》或《六日圣灵赞》),是公元4—5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先后)撰写的文章,汇成“文集”;取名《六天》是因“文集”中颂扬和赞美上帝在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六天”之内创造世间万事万物。

《生理学家》(俄语译名是«Физиолог»,这个俄译名与书的内容也“对不上号”),是公元2—3世纪依据早期基督教观点(据称当时出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创作的有关现实世界“存在的”和虚幻的想象的“动物植物”的书(Гудзий 1955: 134)。必须指出,在创作这两部书时还没有“罗斯”这个名称(及“实体”)。罗斯是公元9世纪下半期才立国的。而这两部作品是11世纪后才传入罗斯并译成古俄语的。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在其他非斯拉夫地区产生的“作品”并不能反映当时罗斯科学发展的水平!

科普洛夫的《基督教测地学》原名是«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Космы Индикоплова;在英语中,它被译成“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stes”(根据英国剑桥大学1909年版译本——转引自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第236页)。这是公元6世纪拜占廷航海商人哥斯马斯撰写的经商回忆录中记载从拜占廷经红海、印度洋沿岸国家途经的城市、港口以及山川、河流等地形地貌和诸多物产等。这本书“成为中古东西方贸易的指南和旅行家的必备参考书”(陈志强 2001: 236, 243)。

把Косма Индикоплов译成“库兹马”(名)和“英基科普洛夫“(姓)是我国俄语界中常见的一种翻译“习惯”,即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直接译音。就以这个“姓”和名来说:汉语译成“库兹马”系译自俄语Кузьма,它与Косма, Козьма均译自希腊人名字(用拉丁字母拼写)Cosmas(意思是“美化”、“装饰”等;俄罗斯人翻译古希腊人姓名时将末尾的音-s, -us, -os等省去不译)。但是,“Индикоплов”并不是“姓氏”——拜占廷希腊人没有这个“姓氏”,俄罗斯人也没有此“姓氏”(何况当时也不存在“罗斯族人”这个名称;俄国人从公元15—16世纪才开始有所谓“姓氏”)。我国的有关俄罗斯的作品(特别是译作)中总有人将以-ов(-ёв), -ский等为结尾的“专有名称”(不管是俄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译成斯拉夫人的以“-(奥)夫”、“-斯基”等结尾的“姓氏”。

无怪乎钱钟书先生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猜乱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风”(自《林纾的翻译》)。

8 关于《法与神赐说》

古罗斯11世纪上半期出现的《法与神赐说》(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也译为《法律和神恩讲话》或《谈法律和神恩》,这是当时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符拉基米罗维奇的“王家寺院”的神甫伊拉利昂历时十余年写成的。当此人(于1051年)在雅罗斯拉夫大公和基辅罗斯政教权贵出席的庆典上当众“宣读”此“论文”(后世俄罗斯宗教文化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篇“宗教-政治论文”——религиоз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рактат)时,他还不是“大主教”(或“都主教”);他是稍晚被雅罗斯拉夫大公“推荐”(或“提拔”)为基辅教区的都主教的。这里的“奥秘”还有待深入分析研究。但他在任期很短(1051—1053年),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谈及其后来的“去向”。他在该文中主要为雅罗斯拉夫大公及其父亲(让全罗斯皈依基督教的基辅大公符拉基米尔一世)“歌功颂德”和赞美基督教(当时是拜占廷东正教)“光照俄罗斯大地”。

迄今为止,我们只见到它的古文“抄本”的后世“铅印”本(用现代俄语字母排印),没有汉语译本,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否有“现代汉语译本”。我们曾试图逐字逐句“读”它的文本,但由于文本根深,多次尝试而未能卒读。某些研究《法与神赐说》的俄苏学者并不认为它是纯“宗教性的”,而是认为这篇《论文》是迎合当时罗斯统治者的政治-宗教需要而撰

写的。

该文是借鉴和摹仿了古希腊的宗教演说文，可做以下梳理和澄清。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学者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斯（？—公元前8年）著有《论早期演说家》，可以说这个“早期”是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是演说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许多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同时就是杰出的演说家，他们深受古希腊的“修辞学”、“语法学”、“雄辩术”的教育和熏陶。例如古希腊演说家、雅典雄辩师伊索格拉底（有人译为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及其著名的演说《奥林匹克大祭演辞》；后来又有希佩里德斯（公元前390—前322年），据说他是伊索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门生，代表作有《斥菲利庇德斯》；狄摩西尼（公元前？—前322年），代表作是《斥腓力辞》（指马其顿国王腓力三世）；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代表作有《论演说术》、《为米洛辩护》等，以及其他古希腊-罗马的演说家和雄辩师。

因此，从古希腊演说家算起，到罗斯的《法与神赐说》及其作者伊拉利昂，有千年之久，甚至千年以上。

9 结束语

我们在上面围绕所谓“拜占廷宗教文化（其实不止‘宗教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谈了一些初浅的看法。其实，拜占廷文化继承欧洲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它有所发展；同时拜占廷希腊人又将自身文化传统传播至整个斯拉夫地区、阿拉伯人地区（如小亚细亚等地）以及中古西欧等地区。拜占廷文化对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宗教文化——东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和文字文献为载体的拜占廷教俗文化的影响。

总的来说，拜占廷文化对斯拉夫地区的影响最为深远。在它的影响下，西部、南部和东部斯拉夫地区先后（从公元九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初）形成了三个“斯拉夫文化中心”。后来，它们各自有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例如，中世纪晚期，某些西部和南部斯拉夫地区（波兰、捷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由于政治（包括地缘）、宗教等一系列原因，转而皈依罗马天主教，采用拉丁字母。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当代中国学人，对于学习、了解、研究欧洲文化，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拜占廷文化仅仅是“开始”，仍有待进一步努力。

附注

1 参阅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中的词条《希腊文学》等等。

2 例如：邓裕新著《拜占廷文化》——载《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主编戚国淦、马克垚，重庆出版社，1986年）；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第五章的《拜占廷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朱寰、王建吉著《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第十章第一节《拜占廷帝国》中的“拜占廷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乔明顺主编《简明世界史》第八章第四节《东欧诸国》中的“拜占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

3 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俄文“古籍”译本，书名是《古史纪年》（王松亭译，李锡胤、左少校）

4 修昔底德（Thoukydidos，约公元前460-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雅典斯巴达战争史》等史书。

5 见Д.С. Лихачёв译成现代俄语的《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1990年版）；另见Лихачёв和Еремин编译的《11—13世纪基辅罗斯艺术散文选》（〈苏〉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7，第3-9页）。

6 《使徒行传》的俄语名称《Апостол》；Житие的意思是“传记”、“生平”（后来俄语中用外来词Биография

“传记”代替), 如 житие святого “圣徒传”, княжеские жития “王公传记”, монашеские жиния “僧侣传记”等。

7 《大汉俄词典》(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选编, 商务印书馆, 1985年), 第1362页。

参考文献

- [1]Истрин. В.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5.
- [2]Георгиев. Е. Словен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до Кирилла и Мефодия[M]. Москва: «София», 1952.
- [3]Еремина И. П. и Лихачева Д.С. (Сост.,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Киевской Руси XI — XIII вв.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Гос.лит., 1957.
- [4]Срезневский. 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1[M]. СПб.: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902. 附录《文献索引》, 内中列出89部《传记》或《传略》、《生平故事》。
- [5]Крат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ат. Т. [Z]. Москва: Сов Энцикл., 1962.
- [6]Гудзий Н.К. (Сост.)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древн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 — XVII веков[M]. М.: Учпедгиз, 1955.
- [7]曹靖华. 俄国文学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 [8]陈志强. 拜占廷学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9]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 [10]邓裕新. 拜占廷文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6.
- [11]任光宣. 俄国文学与宗教[M]. 西安: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5.
- [12]任光宣. 俄罗斯当今的宗教热潮[A]//俄罗斯: 解体后的求索[C].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0.
- [13]古谢伊诺夫·伊利特茨. 西方伦理简史(刘献洲等译)[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14]郝斌、戴卓萌. 俄罗斯概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5]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纂室. 大汉俄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6]乐峰、文庸. 基督教千问[M]. 红旗出版社, 1995;
- [17]乐峰. 东正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8]李赋宁. 欧洲文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9]任光宣. 俄罗斯艺术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0]徐新. 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到启蒙运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1]赵复三. 宗教·精神文明·民族团结[J]. 群言, 1985(7).

Discrimination and Correction of the So-called “Influence of the Byzantine Religious Culture on the Russian Culture”

Zuo Shao-xing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resses our studied opinion on the so-called “Influence of Byzantine Religious Culture on the Russian Culture” (which is from the Book *The Russian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We consider that the quotation (and also proposition) is doubtful and therefore incorrect becaus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and Middle-Greek (Byzantine), their culture never limited itself only in the sphere of the Religious Culture.

Key Words: Byzantine; Russian; religious; culture

作者简介: 左少兴 (1930—), 江西永新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文化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7-02-20

[责任编辑: 刘 锟]